

目 录

前言	李书龄
慈祥恺悌 流风远——怀念董必武伯伯	
和我的父亲陈潭秋	徐慈君 (1)
缅怀我祖父张培爵在北京就义前后	张泽孚 (7)
忆爸爸——追记刘桂五烈士在西安	
事变前后	刘清芳 (13)
大革命前后的回忆	刘 儒 (20)
绥西抗日三战役	杨奇峰 (25)
“一二九”时期的几段亲身经历	杨锡钧 (29)
回忆保定女二师两次学潮	李天申 (49)
海淀的由来	鹤皋辑录 (56)
海淀的变迁和旧园林	焦 雄 (59)
海淀镇槐树街一号——参加北平和	
谈的回忆	卢其然 (72)
漫话老海淀	祝伯权 (79)
✓北京市基督教会海淀堂	基督教会海淀堂供稿 (83)
海淀清真寺	何宜昌 (86)
海淀工商联会的历史沿革	
	海淀工商联供稿 (89)
海淀镇胡同史略	焦 雄 (93)
解放以来海淀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梗概	
	老戴根据区卫生局大事记整理 (102)

慈祥愷悌流风远

——怀念董必武伯伯和我的父亲陈潭秋

徐慈碧

今年三月五日，我应邀来到湖北省红安县，参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当我们在他老人家的塑像前久久默立的时候，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在戎马倥偬中关怀后辈的深情厚谊，历历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九一九年夏，我父亲陈潭秋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来到上海，经同班同学倪季瑞（侧天）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同志。由于他们都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为了拯救中华，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把它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因此，他们商定以办报兴学的方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唤醒民众。当时办报困难重重，难以实现。董老伯和我父亲就决定筹办一所中学，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的新青年，成为拯救中华的中坚力量。一九二〇年，经过多方奔走，凝聚他们心血的私立武汉中学，终于在武昌粮道街开学了。董老伯是该校的董事长，并负责讲授两个班的语文课，我父亲在校执教并担任班主任工作。在此期间，董老伯和我父亲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展组党建党活动，发起组织湖北省共

产主义小组，革命火种迅速传播开了。一九二一年七月，董老伯和我父亲被选为湖北省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从此，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出现了。

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和董老伯并肩战斗，为共同革命理想而努力奋斗。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新兴的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蒋介石背叛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人，我父亲被迫转入地下。我父母离家出走前，把我和弟弟送到外祖母家，托姨舅抚养。我父母和董老伯等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后，他们在打破黑暗枷锁、求生存、争自由的斗争中，弃家为国，出生入死，很长一段时期，和我们姐弟两个断了音信。

直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挽救危亡，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国共第二次合作，进行了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在这期间，董老伯担任八路军驻南京、汉口和重庆办事处的领导工作。这时董老伯与我姨母取得了联系。一九三八年武汉吃紧，我随姨母逃亡到了湖北恩施，在这块还没有战火的乡村，我考上了湖北联合第七女子中学，董老伯始终惦记我和弟弟的生活和出路，时常和我在重庆的姨母联系，询问我们姐弟二人的情况。尽管当时十分困难，董老伯仍然经常给我们寄钱寄文具和生活用品。当我们收到长辈寄来的东西时，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和感激！盼望早一点见到他老人家，我们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向他老人家表示问候和敬意。

一九四五年，我高中毕业参加统一高考，被四川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了，当我来到重庆第一次去看望董老伯时，我的心怦怦地跳，兴奋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到了曾家岩五十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见到了日夜想念的董老伯。本来我心里有好多话要向亲人诉说，可见到亲人了，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慈祥的董老伯问了我们的情况后，安慰我鼓励我，随后他老人家还告诉我有关我父亲的情况。这时我才知道，我父亲是在一九三九年受党的委托，作为党代表派驻新疆的，随我父亲一起去新疆的还有党的干部百余人，协助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巩固抗战大后方新疆。董老伯告诉我，现在他们在新疆的情况不太清楚，叫我不要焦急，一俟有了确切消息便马上告诉我。这时期，我常去看望董老伯，每次他老人家都十分关切地问长问短。一次我告诉董老伯学校大闹学潮，教学常常停顿。董老伯对我讲，参加这种运动，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嘛！等以后有机会，送你去延安学习。

原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新疆军阀盛世才也跟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二年，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一夜之间将我党派赴新疆工作的全体同志，全部扣押继而投入监狱，严刑拷打，非法审讯，妄图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解放后才知道，当时我父亲在狱中继续领导我党的同志进行斗争，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与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一起被盛世才一伙残酷地秘密杀害了，直到一九四三年初党中央才得悉派赴新疆工作的百多名干部被捕了，即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设法营救。一九四四年由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国民

党正式提出释放新疆被捕同志的要求。

当我在重庆得知和我父亲一起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全部被捕的消息时，我忧心如焚，天天盼望父辈们能够早日冲破牢笼，返回解放区。董老伯当时心情也很沉重，他老人家告诉我，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有党的关怀，这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可是营救一直没有结果，直到一九四五年，蒋介石被迫签定了“双十协定”，协定中明文规定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国民党当局仍一再推委拖延，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父亲和其它被盛世才关押的同志，仍无消息。一九四六年七月重庆新华日报登出新华社消息：经张治中先生亲自办理，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多名中共干部已经集体宣布无罪释放，并护送返回延安，还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尚未返延，闻讯后，我的心情极端焦急不安。这时董老伯派人把我叫到办事处，告诉我党中央正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你父亲和毛泽民等同志，叫我不要过于焦虑。当时他老人家还亲切的招呼我和他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临走时，还给钱叫我添置衣物用品。后来我们才知道党中央十分关心我父亲和毛泽民同志的安危。在集体释放护送返回的新疆工作同志的时候，周总理打电话给在新疆的张治中先生，一方面表示感谢，同时提出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即使残废了也要求他送回延安。张治中当时复电总理：陈、毛下落不明。

随着形势的发展，董老伯离开了重庆，转到南京梅园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当时我仍继续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上学，一九四九年我大学毕业，这时全国也解放了。解放后我才知道我父亲和毛泽民、林基路于一九四三年已被盛世才

残酷杀害了，凶手已被辑获。噩闻噩耗，我悲痛欲绝。爸爸呀！您一生献身革命，却没能看到今天革命的胜利。多少年来，我和弟弟是多么想望您啊！多少次我在梦中梦见我们姐弟俩偎依在您的怀抱里，而今梦中的情景再也不会变成现实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三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都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我和弟弟作为烈士的后代，党的后代，悲恸之余，回想起自大革命失败，爸爸妈妈离家转入地下以后，在白色恐怖下，在抗日战火中，党组织多次派人找到了我们，关怀我们，特别是董老伯和周总理等革命先辈亲切关顾，更使我们感到党组织比亲爹亲娘还要亲切。一九五一年党组织把我和弟弟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董老伯得知我们到了北京，立即把我们姐弟俩接到颐和园（当时董老在颐和园休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首都我们见到了敬爱的董老伯，喜悦的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表达出来。

记得董老伯和我们谈起父亲的牺牲，谈了革命走过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多少革命先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开辟了通向今天胜利的道路。董老伯勉励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专业知识，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这是多么亲切的教诲和语重心长的嘱咐啊！我们姐弟俩围坐在董老伯的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牢牢地记在心上。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啊！董老伯还带着我们游览了颐和园，整整玩了一天，吃过晚饭后才送我们回学校。

董老伯的关怀和教诲，在我的脑海里激起无歇的浪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它促使我冷静地思考着，怎样使自己今后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才不辜负董老伯的教诲。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真谛：人生的价值就是一生无私的献

身革命事业。我决心按董老伯的教导，继承先烈遗志，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从此我在董老伯的指引下，幸福的成长起来。

不幸的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乌云笼罩中国大地，我和董老伯的音信又被隔绝了。不久我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北京。我回到首都，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董老伯。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董老伯已搬出中南海，等我见到他老人家时，董老伯已比七八年前苍老多了，精神也不太好。见面后，他老人家问起我这几年的经历和地方工农业生产状况。我向他老人家作了如实的汇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脸色十分忧郁。这时何妈妈（董老的爱人何莲芝同志）悄悄告诉我：董老对当前局势忧心忡忡，自六六年以来，他承受了各种形式的冲击，身体很不好。这次见面，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董老的家，一年以后董老伯与世长辞，在悼念大厅里，我热泪长流，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在那腥风恶雨的日子里，我心头有愤恨，有徬徨，有无限的悲愤之情，然而，我只能哭泣！

今年春天，当我在红安县参加董老伯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历史的回忆，又一幕幕的涌现在我的心头，报笔记下我的回忆，以纪念董老伯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六年三月书于湖北红安八月修改于北京

注：“慈祥惶梯流风远”是董必武诗选 47 页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而作的诗中的一句。

回忆我祖父张培爵在 北京就义前后

张泽孚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缅怀革命先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祖国独立富强，建立民主共和的不朽功绩的时候，我无限深情地怀念祖父张培爵反清举义，戮力倒袁，为民主共和而英勇奋斗的一生。

张公培爵是四川荣昌县人，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生于一个民间中医的家庭。一九〇三年考入四川高等理科师范学堂，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从此，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曾在川西南与熊克武、谢持、黄复生等革命党人一起，多次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杨庶堪、夏之时、朱之洪等在重庆起义成功后，被推为蜀军政府都督。不久成都和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实行军民分治，张公培爵出任四川民政长。

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阴谋剪除异己，扑杀革命，先后免去了各省革命党人的领导职务，有的调到北京，就近监视。一九一二年，我祖张培爵被袁世凯以咨询边防民事为由，电调入京。当时我祖父慨然解职，取道重庆乘舟东下，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到达重庆，受到蜀军政府成员和同盟会同志以及重庆府中学堂老同事们的

热烈欢迎。在旧友欢叙中，有人问：“君今入都，果欲何为？”我祖父察觉袁世凯心怀不测，奉召入京，前途吉凶难卜，因此，见问以后，只是面露愁容，叹息不语。

十一月中旬抵达武昌，他仍关怀川政。到达武昌后，即连日与湖北都督黎元洪会商川盐运销湖北问题。原来自太平天国以来，川盐行销楚岸，已是定例了，每年川盐运楚多达一千二百馘之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四川与湖北的水运一度停顿，川盐大量积压，影响了千万户盐民生计和四川军政府财税收入，这次经武昌，特地与黎元洪会商解决川盐运鄂问题，为桑梓为革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会商获得初步结果后，即启程赴上海。

到上海后，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居正、王宠惠、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祖父向孙中山先生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大业的指教，又与黄兴等人多次进行商谈以后，祖父对当时革命大局和袁世凯的专制野心，已有所了解，因此，他在沪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畅谈大局，真令人忧，以大局实难以笔罄也”。祖父怀着誓与民主共和共存亡的决心，毅然离开上海，经京浦路乘火车赴京。

到北京后，即向袁世凯提出辞去四川民政长之职，要求出国考察政治。袁世凯假详商川政为名，授以总统府高等顾问，将他羁留北京，就近监视，甚至连往来书信，都常常不能收到。因此，他在北京寓所，只好闭门不出，佯装不准出洋考察，就不问政事，“日读史籍以解烦愁”，来麻痹袁世凯的监视。他化名“智涵”（又作老韩）与友人通信，以逃过袁世凯对通信的监视与扣留。二月革命爆发后，他摆脱了

袁世凯鹰犬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上海，约集了原蜀军政府的革命党人谢持、夏之时、黄复生等同志，在谢持家连日聚议，八月十三日我祖父决定再回重庆，参加讨袁军，用实际行动支持熊克武、杨庶堪的反袁斗争，（此事见谢持日记）因入川航运已断而没有实现。忽闻熊、杨孤军奋战，四川讨袁军已失败，俱化装逃出重庆，亡命日本。当时很多友人劝我祖父出国暂避锋芒。我祖父考虑到如果大家全都出走国外，国内北方革命机关的工作，又由谁来主持呢？因此，他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北上，担负起同盟会北方机关工作。为了机关的安全，十一月迁居天津英租界福善里十号。这时，曾在成都高等理科师范学堂念书时一起组织青年会的老同学邹杰，他是蜀军标统和夔府知事，熊克武、杨庶堪举兵讨袁，他率旧部百余人赶赴重庆，刚至重庆附近的木洞时，讨袁军已失败，邹杰也被迫化装逃至上海，辗转来到天津，遂和我祖父一道从事秘密的反袁斗争。

袁世凯对待革命党人，一贯采取收买和镇压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他深知我祖父张公培爵是四川同盟会的主要人物，在四川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亟欲收买张培爵为其复辟效劳。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授意他的内务部总长提出任命张培爵为四川巡按使，通过报纸，大事宣传，妄图诱使张培爵就范。挚友李寒友也来信劝我祖父“不妨屈就”。我祖父当即回信谢绝，信中写道：“不肖宁隐以求志，断不愿俯同群碎，争腥啄腐，以自贬其操也。”

当我祖父北上时，已洞察袁世凯窃国野心，革命党人处境日危，与同盟会老盟友谢持和余际唐等同志商议，为防不测，各将其子送往国外留学，以保留后代，当时我祖父把十

四岁的独子张钟洛送往法国。祖父只身移居天津后，辞去四川民政长和总统府高等顾问等本兼各职，拒领每月六百元的高薪，历年积蓄又全部交付黄兴作为革命经费了。在天津为了掩人耳目和维持生计，购置三部织袜机开设袜厂，俨然弃政从商。当时为了维持生计和筹措儿子在法国的学费，经济十分困乏，常在家书中流露焦急之情。但仍未为袁世凯利禄所动摇，其高尚的革命情操，实堪敬仰。

天津英租界福善里十号寓所，经常有革命同志往来。当时从日本回国的青年，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极为愤恨，暗中组织“血光团”，准备暗杀袁贼。我祖父虽认为暗杀手段，不能根本清除袁贼反动势力，但仍对他们的革命热情积极支持，他们经常来天津向我祖父请示机宜，密商大计。祖父并在经济上给他们大力援助。

袁世凯见利诱不成，乃密派李捷三，通过经常与我祖父往来的陈乔邨的介绍，与祖父逐渐稔熟，一日李捷三申言愿与祖父合资设肆，扩大袜厂。祖父正因生计难以维持而担忧，当即答应与他合资经营。次日，李捷三邀陈乔邨和我祖父乘电车一同酒店饭宴，途中李拿出一卷稿纸交给我祖父，说是合资办厂，虽属小事，亦应订立合同，此合同稿，请君审定。因车将至站，没有详细审看，我祖父随手将一卷稿纸纳入怀中。出了租界，刚下电车，忽然军警团团围住，从我祖父身上搜出李捷三所给稿纸，乃是反叛袁政府的“志诚团”章程，并不是袜厂合同，这时找李捷三已不见人影了。这样我祖父和陈乔邨同时被捕了。同日邹杰也被捕了，同囚于杨村。袁世凯命令押赴北京西郊宛平军政执法处，这是袁世凯设立的专门陷害杀戮反袁革命志士的屠场。军政执法处

捉调钮传善，是重庆起义时，被祖父剪去发辫，押同游街示众的重庆知府，被宽大释放后，投奔了袁世凯。钮传善见祖父入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袁世凯下令判处张公培爵死刑时，他立即执行。凡军政执法处执行死刑，都在凌晨，由狱吏厉声急呼其名，祖父闻狱吏声，已知必死，凛然走出，执刑者出示血光团名册，以反叛罪处死刑。这个名册是陈乔邨书写的，祖父才知道自己被这个叛徒出卖了。狱吏呼我祖父之名后，又呼叫陈乔邨，陈惊起，叫喊“今天也要枪毙我吗？”这是袁世凯杀人灭口的故伎。

同时被捕的邹杰，经严刑拷打，骨肉都打烂了，没有逼出一句供词，也以血光团罪名处死刑，与祖父同时被杀害。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我祖父被杀害后，儿子钟洛远 在法国，夫人王氏及女儿钟兰、钟蕙、钟芸都在四川老家。友人同盟会员曾道（号通一）、李伯申适在北京，闻讯密令我祖父的两个随从熊少川和潘式斋及从子张钟屿在乱葬岗中寻找了尸首，买了棺材，把尸首装殓了。在京的同志又合力迁柩南行，灵柩至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同盟会同志认为：时局不定，入川道路险阻，主张暂厝灵于上海宝山里公墓，而以衣冠塚葬于重庆。不久袁世凯死了，重庆革命党人朱之洪等集资，将我祖父的遗骸运回四川省荣昌县荣隆乡故里。至一九四三年，前国民政府明令为革命先烈张培爵举行公葬，朱之洪老人任公葬主任委员，公葬时，朱老亲扶灵柩，置入墓穴，众人泣不成声。一代革命忠魂，从此长眠地下。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奋斗，终于完全实现了，今天正在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中国民主革命的先烈们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他们所渴望进行的建设事业，亦可告慰于九泉矣。

忆 爸 爸

——追记刘桂五烈士在西安事变前后

刘 清 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迄今已经五十年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使中华民族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枪口一致对外，全民奋起抗日的新局面。我的父亲——刘桂五烈士是这次事变的主要参加者，因此每逢“双十二”之际，妈妈刘素珍总要我追忆往事，诉说我爸爸抱着满腔爱国热忱，接受张学良将军的命令，按照张学良将军的部署，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情景。

我父亲于一九二四年在热河参加宋哲元的学兵队，当时二十二岁，开始了戎马生涯。一九二五年到热河地方军阀白凤翔部下当兵，历任排长、连长。一九二八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调防黑龙江，任少校连长。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我父亲率部在密山与苏军作战“有功”，被破格擢升为第十八团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到关内，父亲先后辗转于河北保定、陕西和甘肃的庆阳、焦口等地驻防。父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极为愤慨，爱国心切，曾恳切陈词张学良，请缨杀敌，愿带“五百壮士”回东北老家武装抗日。一九三五年东北军整编后，成立骑兵军，何柱国任军

长，黄显声任副军长，白凤翔为第六骑兵师师长，我父亲任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从此结识了黄显声将军的秘书刘澜波同志，和张学良将军派驻骑兵军的联络参谋、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同志，同时与骑兵三师七团上校团长陈大章是知心好友。陈当时在团内成立学生队，大部分是“一二九”骨干，学生队也很快与我父亲结识了，由于共同的抗日爱国思想，很快便成为知心朋友，接受了我党的“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主张。十八团是骑兵六师的主力，我父亲与白凤翔又是患难之交，加之黄显声也赞同我党的抗日主张，所以尽管东北军当时担负“剿共”任务，骑兵军却按兵不动，尤其是骑兵六师与红军经过多次交往，成为友军。因此，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军代表朱瑞与骑兵六师代表经过秘密会谈，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具体内容是：

(1) 不受命进攻红军。

(2) 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

(3) 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

(4) 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作友谊退让，但应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

这一文字协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渗透着我父亲多少心血啊！因此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十分赞赏，并建议陈大章（陈曾是张学良侍卫副官）推荐我父亲到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一九三六年秋，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王曲镇举办军官训练团，我父亲在训练团刻苦认真学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多次受到张学良将军召

见谈话，受到将军的赞许与信任。训练团结业后，在张公馆晋见时，当即留在侍卫副官处。

西安事变前夕，十二月八日张学良将军在公馆西楼单独召见我父亲。经过一个多小时密谈，把捉蒋重任交付给我父亲，并对我父亲说：“我前几天跟委员长谈话，已说过我有一个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是热河朝阳县人，想派他回家乡组织游击队，这对东北军抗日过热河时，会是个有力的配合。今天下午你去向蒋委员长辞行，这样你可以侦察蒋介石的住室、客厅及院内外和华清池的情况”。密谈后，张学良亲自驾驶小汽车带着我父亲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到达五间厅，张把我父亲介绍给蒋介石后，张即退出客厅到钱大钧的办公室去了（钱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介石和我父亲谈话约三十分钟，便和张学良一起告辞回到张公馆。张学良又听取了我父亲的发动事变的行动建议。张学良将军问我父亲：“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在西安？”我父亲回答：“只有十几个人”。张说：“你的兵力太孤了，我让孙铭九带领警卫二营听你指挥。”我父亲说：“我们的师长白凤翔是主张抗日的，他的手枪队参加这一行动，会更有把握。”张问：“白可靠吗？”我父亲说：“可靠。他不但主张抗日，还是倾向付司令的。”张说：“那好。但是你不要告诉他，由我来直接通知他。”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将军在公馆又召见我父亲，面授“捉蒋”机宜，并对我父亲说：“你不要顾虑你的家庭，你的亲属就是我的亲属。”我父亲当即表示：请付司令不要顾虑我的家，我的家是老百姓的生活，我出了事不要紧，只要能够促成抗日，赶走日本鬼子，他们就可以回老家

去。

当日晚饭后，张学良将军派车送我父亲回家，并叫父亲在家等候，到时派车来接。回家后，父亲告诉母亲，先不要休息，一起说说话。父亲说：“当前西安形势紧急，今晚我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去捉蒋介石”。我母亲一听就惊呆了，连问两次“付司令去吗？”我父亲回答：“去”。又说：咱们家对面住的是国民党队伍，我走后你带着孩子到保康里戴付官家里去，明天我能回来就去接你们，如果没人去接就不要回来。我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人，强忍忧虑，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深夜十二点，张将军派车接走我父亲，我们母女俩就直奔戴副官家，不久，西安城中枪声四起。我母亲一直呆呆地坐到天明，直到早上十时，才有人送信来说：团长回来了，让你们回去。我妈妈一夜提心吊胆，这时一颗心才放下来了。回到家既庆幸又后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见到我父亲眼泪却流个没完。

原来，十一日夜里十二点张将军接走我父亲后，张、杨两位将军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宣布了捉蒋兵谏计划，下达了行动命令，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伟大的西安事变。总指挥是刘多荃。直接担负捉蒋任务的有三支兵力，一支是由一〇五师一旅一团张治邦团长率部担负封锁华清池、临潼火车站和西临公路；一支由白凤翔和我父亲率警卫二营营长孙铭九带领突击队活捉蒋介石；另一支是指派当时负责警卫华清池的警卫一营营长王玉瓚率步骑兵三百多人协同捉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我父亲和白凤翔、孙铭久率部由西安出发，车抵灞桥镇，与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突击队会合，立即乘车直奔华清池，早四时进入阵地，白凤翔在华清